

诺贝尔夫妇之战： 怎样摆脱贫穷？

丈夫出生在印度，妻子来自法国，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班纳吉夫妻，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，投身全球贫困问题二十多年。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

历史上，诺贝尔物理学奖、化学奖、医学奖等都产生过夫妻档，最为著名的当属居里夫妇。今年，诺奖夫妻档再添一对——58岁的阿比吉特·班纳吉和47岁的埃斯特·迪弗洛。今年10月，这两位美籍经济学家因抗击全球贫困而蟾宫折桂，一起站上了国际舞台。并且，迪弗洛还打破了最年轻经济学奖得主纪录，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位女性得主。

丈夫出生在印度，妻子来自法国，这对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夫妻，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，投身全球贫困问题二十多年。他们试图弄清楚穷人为什么这么穷，穷人该如何脱贫。放到今天，这是一个引起广泛深思的问题。

从师生到伙伴

1967年，在加尔各答的一片富人区里，6岁的班纳吉时常看着房屋后面简陋的小棚屋，羡慕着那里的孩子有更多时间玩耍、能在各种运动中击败自己，甚至可以说，他有些嫉妒。但这种嫉妒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慢慢转变成一种对国家、对统治阶级和机构的愤怒，他试图

去成为改变贫富差距的一股力量。如身为经济学教授的父母所期待的，他从加尔各答大学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一路读到哈佛大学，27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93年，班纳吉选择到麻省理工执教。

此时，迪弗洛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，她为了研究前苏联历史课题，正在莫斯科进行长达10个月的调研。在这，她与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教授进行了一次深谈，之后，她决定转攻应用经济学。其实，这一切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

迪弗洛的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，她和母亲一样感性和柔软，幼年时她常见到母亲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计划。6岁时，她读到了一本特蕾莎修女的漫画，书中将加尔各答描述成一个人满为患的城市，每个居民都住在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里。她深切同情着万里之外的陌生人。同时，她又继承了数学教授父亲的逻辑天赋。拥有和父亲一样的学术理想，又怀有同母亲一般帮助他人的心，俄国相识的教授告诉她投身发展经济学是不二选择。因此，1995年，23岁



**阿比吉特·班纳吉和
埃斯特·迪弗洛**

阿比吉特·班纳吉 (Abhijit Banerjee)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，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。埃斯特·迪弗洛 (Esther Duflo)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。两人因在“利用实验性方法在全球脱贫”方面所做的贡献，获得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也是首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夫妻档。



的迪弗洛来到麻省理工攻读经济学博士，她与34岁的班纳吉相遇了。

这份相遇并不浪漫。此时，身为迪弗洛导师的班纳吉已经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，他的妻子是麻省理工的同事——一位文学教授。两人的爱情是否从这开始萌芽，外界无证可循，不过两人传出恋情则是在迪弗洛毕业多年后。但我们可知的是，迪弗洛极大影响了班纳吉后期的研究方向和风格。

获奖后，大量印度新闻称“班纳吉和他的妻子”，不少人也想当然地以为迪弗洛的荣光是借力于丈夫。然而回看班纳吉早期的论文，我们就能发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班纳吉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，导师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专家埃里克·马斯金，后者是

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。班纳吉的研究深受马斯金影响，他早期论文都是偏向纯理论的，比如他曾用博弈论分析“羊群效应”。当然，他也尝试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一些实际问题，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治理问题，但研究方法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。作为博导，他指导迪弗洛也是这个套路，两人最初合作发表的论文都是理论化的。

但与此同时，迪弗洛已经开始独立尝试用实验性方法来研究问题。当时，她的另一位导师乔舒亚·安格里斯特热衷于实证研究，她看来更像是深受他的影响，继而影响了班纳吉。因而，班纳吉才从安静的象牙塔来到了童年就熟悉的贫民窟，从理论研究转向了随机控制实验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迪弗洛不是班纳吉光环下的女人，而是成就他的女人。

1999年，迪弗洛博士毕业，去了普林斯顿大学，短短3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。很快，贫民窟的问题再次将二人联系到了一起。迪弗洛来到麻省理工教发展经济学，成为班纳吉的同事，两人从师生成为了伙伴，开始筹划宏大的救援计划。

贫困实验室运营

目前，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，每年有近500万儿童因一些易治愈的疾病死于5岁前。在一次TED演讲中，迪弗洛曾指出每年援助这么多，为什么非洲的GDP仍然没有增长，非洲这些地区的各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迪弗洛说我们没法回答援助好不好，但能回答一些更小的问题。

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看来，全球贫困问题看似巨大，但可以通过实验，将它分解为一个更小的、更精确的问题来处理。例如，为了找到

提高儿童健康水平的方法，可以通过教育、医疗等多途径来设计实验，找出什么样的干预措施有效。这种在真实环境下通过随机干预来观察被试者的实验叫田野实验，也称之为 RCT。以前，这种实验方法主要用于药物试验，证实了哪些药物是好的，哪些是坏的。班纳吉他们认为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经济学。他们是这一实验方法的忠实拥趸，更是其重要推动者。

为了通过实验来找出科学的扶贫政策，2003 年，班纳吉、迪弗洛和另一位哈佛的印裔教授联合创建了阿卜杜勒·拉蒂夫·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 (J-PAL)。刚成立时，这个实验室只有 6 个人，主要研究地在印度和肯尼亚。

贫穷的根本是教育落后。实验室成立当年，班纳吉和迪弗洛就针对教育问题展开了研究。他们发现，有些地方并不是教育投入不足，而是教师缺勤严重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，两人和今年另一位诺奖得主克雷默联合进行了一次实验，这次实验在一个非营利组织经营的 120 所学校中进行。通过实验，他们发现鼓励老师每天与学生合影，或是缩短老师的合约期限，都可以显著减少缺勤情况，提升教学效果。班纳吉和迪弗洛还发现，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，适应学生需求，也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。他们的这一项研究，让 500 多万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的补习辅导计划。

教育落后还有一大原因是学生出勤率低。以肯尼亚来说，班纳吉和迪弗洛发现蛔虫影响孩子健康，导致他们出勤率低。为了证实这一想法，他们将肯尼亚 75 所小学的孩子分成了实验组和对照组，实验证实驱蛔虫提高了健康程度的孩子出勤率更高，进而这些孩子一生的收入可提高 20%。在两人看来，政府只要为每个儿童花费 1 美元的驱蛔虫成本，国民经济增长

就能提高 20%。且不论这一结论是否正确，但这一研究据说让 6000 万孩子得到了免费的驱虫治疗。

贫困实验室运营 16 年来，班纳吉和迪弗洛参与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 80 余个实验。

就能提高 20%。且不论这一结论是否正确，但这一研究据说让 6000 万孩子得到了免费的驱虫治疗。

J-PAL 开始得到更多关注。一方面，实验室获得了更多基金会、政府和个人的支持，主要捐助者包括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、斯隆基金会、马歇尔基金会等。另一方面，它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发展经济学家，集中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问题，展开大规模田野实验。如今 J-PAL 已经在非洲、拉丁美洲、南亚、东南亚、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，拥有全球领先大学的 181 名附属研究人员和 400 名员工。

班纳吉夫妇的实验也开始由教育转向其他领域，其中之一便是疾病领域，比如广泛传播的疟疾。为了探清楚人们打疫苗这件事，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乌代布尔区的 134 个村庄设置了试验点。他们对实验组说，去打疫苗的家庭可以奖励一公斤扁豆，疫苗接种率从 6% 上升到了 38%。类似的方法被应用在肯尼亚地区农民化肥的使用、蚊帐的购买上。通过优惠、补贴等方式来鼓励行动，人们会不会习惯救济，一旦救济停止，就又回到以前呢？迪弗洛却认为，肯尼亚人到第二年会倾向于买第二个蚊帐，他们习惯的不一定是救济，而是习惯了使用蚊帐。

贫困实验室运营 16 年来，班纳吉和迪弗洛参与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 80 余个实验。因在全球贫困问题上的关注和实验成果，两人获得了诸多荣誉。比如迪弗洛就曾在 2010 年获得素有经济学界“小诺奖”之称的约翰·贝茨·克拉克奖，两人还在 2011 年被《外交政策》评为“全球百强思想家”，2014 年共同获得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颁发的“赫希曼奖”。诺奖委员会说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，

正将一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，提升了抗击贫困的能力。

荣誉加身之时，争议也伴随而来。

“小思维”的进与退

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经颁布，各种争议纷至沓来。其中一点是二人的婚外恋。班纳吉和迪弗洛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生下两个孩子，但由于种姓约束，他直到2015年才离婚并与迪弗洛结婚。如果说感情只是八卦的话，田野实验就是班纳吉夫妇连同克雷默获奖的争议核心了。

早前，田野实验很少受到批评，但到了2010年，大坝崩溃，诸多知名经济学家指出这一研究方法存在缺陷，认为过度依赖田野实验的研究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价值并不高。经济学家们对田野实验主要有两点异议：一是药品与援助项目不同。人的基因99.99%都是一样的，新药在随机控制实验中被证明有效，上市基本有效，只有极端个例例外。而援助项目则可能因为每个地方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不同，实验中的变量又多达成千上万个，没办法推广到其他村落。二是田野实验成本高，它即便解决了某方面的问题，也不见得能让国家发展起来。比如北非近些年教育有所提升，但就业问题依然没解决，这是因为没从根本上让地方发展起来，反而造成了政治不稳定。

也就是说，田野实验乍看合理，甚至诱人，但它纠正的只是个人行为，往往忽视了贫困的宏观经济、政治和制度因素，无法解决更大的系统性问题。此外，田野实验是在未告知对象的情况下进行试验，将穷人当做实验对象，而不是与他们合作，引发道德忧虑。因而，有人将班纳吉和迪弗洛大力推行田野实验的方法称为“小思维”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田野实验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，借由它来避免盲目出

除了写书，班纳吉夫妇试图通过更丰富的媒介来让更多人关注全球贫困问题。

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鉴的。

尽管近十年来关于田野实验的争议没有中断过，但班纳吉夫妇和J-PAL前进的步伐从未停歇。他们积极与各地银行、政府、机构展开合作，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了许多反贫困计划，J-PAL成为少有的影响力遍布全球的大学实验室。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贫困，夫妻二人联手写了两本书，第一本书是出版于2011年的《贫困经济学》。两人用15年的时间走遍了五大洲、18个国家和地区最贫穷的地方做调研，写了这本“大成之作”，探究了穷人穷的原因。这本书引起广泛关注，获得当年的高盛商业图书奖。书中，他们写道：通过使每个计划更好地工作，我们一次迈出了一步，以解决全球贫困问题。在想不出完善的解决贫困的办法时，逐个击破至少看到了一点希望。或许这正是班纳吉和迪弗洛钟情于田野实验的原因。

第二本书是今年11月出版的《艰难时期的良好经济学》。这本书借鉴了全球当前有关公共政策的许多辩论，从移民与不平等、全球化与技术破坏、增长放缓和气候变化加速等出发，探索减轻极端贫困的方法。

除了写书，班纳吉试图通过更丰富的媒介来让更多人关注全球贫困问题。他与迪弗洛在世界各地做调研时，还执导了两部纪录片，一部是2006年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乌代布尔区做疟疾调研时拍摄的《疾病的名字》，一部是今年4月完成的《壮丽的旅程》，揭示印度民主是如何受到威胁的。

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依然是个长期问题，今年的诺奖表明，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更加强烈。正如班纳吉和迪弗洛在《贫困经济学》中所说，“也许不是明天，但在我们可以触及的某个未来”。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，世界距离那个未来正越来越近。□